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

中国现代 文学史

下册



孙中田 主编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 册

孙中田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DQ65/2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下册

孙中田 主编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字数342,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485

ISBN 7-04-001151-4/I·7

定价 3.75元

目 录

13. 小说与散文的发展	(1)
左翼文学新军的崛起	(1)
东北作家群	(6)
坚实的现实主义作家群	(11)
“京派”与“海派”	(16)
杂文、散文与报告文学	(19)
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	(23)
14. 巴金的艺术世界	(30)
在中外文化融通中寻求自我	(30)
《家》的现实主义	(34)
觉慧与觉新的形象	(38)
民俗画与情态的显现	(42)
15. 老舍与沈从文	(47)
老舍的市民王国——在风俗描绘中透视世态	(47)
喜剧与悲剧的渗透	(54)
《骆驼祥子》的悲剧意义	(60)
湘西——沈从文的神话世界	(65)
《边城》——诗与画的审美交融	(73)
16. 30年代的戏剧	(77)
左翼戏剧运动与创作	(77)
田汉的戏剧创作	(80)
洪深戏剧创作的发展	(87)

夏衍和李健吾的剧作	(89)
曹禺与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	(98)
从《雷雨》到《日出》.....	(100)
17. 30年代的诗歌.....	(109)
左翼政治抒情诗人殷夫	(109)
中国诗歌会的理论主张与创作	(113)
从后期新月派到现代诗派	(120)
臧克家、艾青出现的意义	(131)
18. 聚集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	(139)
“文协”的成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39)
从“亭子间”走向战地——通俗文艺的勃兴	(146)
文学理论的论辩与斗争	(149)
“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154)
19. 抗战时期文学面面观	(161)
国统区抗战文学概貌	(162)
解放区抗战文学的特色	(166)
“孤岛”、香港、台湾——抗战文学的特殊阵地	(174)
沦陷区文学的简要轮廓	(184)
20. 报告文学的丰收与散文创作.....	(196)
在战火中繁盛的报告文学	(196)
抗日正面战场的艺术展示——丘东平、骆宾基、萧乾等 的报告文学创作	(203)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颂歌——周立波、周而复、沙汀等的 报告文学创作	(209)
散文的风采与杂文的锋芒	(212)
21. 抗战时期的诗歌——民族解放的战鼓和号角.....	(222)
抗战时期诗歌发展的趋向	(222)

田间、柯仲平、何其芳等的诗歌创作	(225)
“七月”诗派的崛起	(235)
艾青的诗歌创作	(237)
艾青诗的美学原则与风格	(249)
22.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创作	(255)
民族抗战的写真——抗战初期的小说创作	(255)
讽刺小说的勃兴——张天翼、沙汀的创作	(258)
中、长篇小说竞写潮	(267)
23.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戏剧	(280)
抗战与戏剧的发展	(280)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舞台上——田汉、洪深、宋之的、于伶等的剧作	(283)
现实主义的深化——夏衍、曹禺、吴祖光等的剧作	(287)
丁西林、陈白尘与讽刺喜剧的发展	(294)
历史剧的勃兴——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剧作	(298)
24.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303)
文化战线上斗争的旗帜	(303)
郭沫若历史剧的思想倾向与风格特征	(307)
25. 新的人民的文艺	(317)
文艺整风运动与新的人民的文艺	(317)
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和创作	(325)
新歌剧《白毛女》	(327)
新诗的发展与李季、阮章竞的创作	(332)
新颖多姿的报告文学	(338)
26. 解放区的小说	(340)
新生活的颂歌，新英雄的传奇	(340)
孙犁小说的抒情风格	(352)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356)
27. 赵树理与丁玲	(363)
赵树理——为农民代言的作家	(363)
农村历史变迁的艺术反映	(366)
赵树理小说文体与语言的特色	(370)
丁玲——对人的精神解放的焦灼思索	(372)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过程	(376)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就与贡献	(378)
28. 茅盾后期的创作	(387)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风云里	(387)
散文的创作	(390)
长篇小说《腐蚀》	(394)
话剧《清明前后》	(397)
29. 老舍、巴金的新贡献	(403)
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	(403)
《四世同堂》的艺术成就	(406)
巴金抗战时期的创作	(410)
《寒夜》的成就与影响	(415)
30.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420)
压迫中奋争发展的文艺	(420)
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论”的论争	(421)
戏剧与小说创作概观	(425)
黎明前的歌吟	(430)
结束语	(436)
后记	(449)

13. 小说与散文的发展

左翼文学十年的创作，以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赫，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进行考察，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据统计，这时期仅中长篇小说，就不下150部。叶绍钧的《倪焕之》(1930)，巴金的《家》(1931)，茅盾的《子夜》(1933)，王统照的《山雨》(1933)，沈从文的《边城》(1934)，李劫人的《死水微澜》(1935)、《暴风雨前》(1936)，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等，一部部色彩缤纷的小说，构成风格殊异的30年代广阔的艺术画卷。至于短篇小说，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左翼文学新军的崛起

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曾指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①。历史的机运和老一代作家的培育，造成了这一时期一大批左翼文学新军的涌现。

这批文学新军，就历史的承传来说，可以视为“五四”时期的“人生派”和“艺术派”在艺术探索中的裂变和重新组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大体道出了他们的取向。在革命的机运中，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显示出对社会革命的关注和历史的责任感，这使他们的小说具有了“革命小说”的特色。蒋光慈、洪灵菲、华汉(阳翰笙)、戴平万等，都曾怀着革命的激情，

^①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表现出突出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觉醒意识。他们的作品，有意识地看取工农革命风潮，显示出理性的光泽。但是，这些作品中，“革命加恋爱”、意念、理想的鼓吹大于形象，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倾向是存在的。1932年华汉的长篇小说《地泉》重版时，瞿秋白、茅盾以及作者本人分别写下的序言，表现出历史性的反思与总结。如果说，这属于从理论上对初期“革命文学”创作模式的自觉反拨的话；那么，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等一批青年作家的涌现，则宣示着革命文学的深化。他们的作品或注重心理刻画，或以讽刺见长，或以血与泪的现实描写，带着鲜活的生机，向革命的现实主义迈进。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少年在桃源、长沙等地中学读书时，便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时，不断地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7年发表的处女作《梦珂》引起文坛的注意。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以女性的独特的视角与细腻情感，以及大胆、越轨的笔致，刻画了莎菲幻灭与彷徨的心态与苦闷的绝叫，表现了五四运动后，知识青年的苦闷与追求，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是对“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母爱和自然的颂赞”母题的超越。作品以对世俗的挑战精神，张扬了自我的性格，自然也沉浸在一种幻灭的氛围中。丁玲早期的三部创作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主人公大多为彷徨中的知识女性，基本可视为“莎菲式性格”的补充、延展乃至复现，与革命文学依然保有距离。

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方向的转换。小说描写了革命者韦护的性格及心态，生活气息浓郁，但在整体框架上，仍陷入当时文坛“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中；嗣后创作的《一九

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社会斗争的更大关注。

1931年，丁玲在战友、伴侣胡也频殉难后，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并于这一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水》。作品以阶级的观念，表现了群众觉悟、反抗的过程。《水》在左翼文学的发展中具有着独特的价值。冯雪峰认为：“这是我们所应当有的新小说。”^①茅盾指出，这篇小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被清算”^②。

张天翼(1901—1983)是一位具有讽刺才能的多产作家。1929年，他的《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上。继之，便有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1931)、《小彼得》(1931)、《蜜蜂》(1933)、《反攻》(1934)、《移行》(1934)、《团圆》(1935)、《春风》(1936)、《追》(1936)和长篇小说《鬼土日记》(1931)、《齿轮》(1932)、《一年》(1933)、《洋泾浜奇侠》(1936)、《时代的跳动》(1936)等问世。张天翼的作品富有讽刺和幽默的意味。他从浅露的“笑”中走向反虚伪、反庸俗、反彷徨的较高层次。他的小说以当代性和社会性的锋芒和“笑”的审美情趣给左翼文学吹进了新的风。张天翼的讽刺艺术世界中自然不乏伪善、狡诈的上层社会人物(如《脊背与奶子》中的长太爷等)；然而知识分子的庸俗、钻营和灰暗不幸的市民生活，始终是他作品的艺术取向，他们巴结、向上爬，以及不稳定的自我感觉，构成悲剧性的苦涩的笑料，却又不能不在这种生活中折腾着，《包氏父子》、《欢迎会》都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包氏父子》中的老包靠着在公馆里伺候人度日，却一心要把儿子包围进洋学堂里。究竟为了什么呢？因为“洋学堂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然而，一连串的事实不断地戳破他这虚幻的

① 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雪峰文集》(二)，第334页。

②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论创作》，第218页。

梦。作品在希望与现实的逆反矛盾中，揭示了老包的巴结、向上爬而又注定碰壁的命运。作品在讽喻的语句中寓隐着使人发笑的喜剧风情，却又掺和着更深沉的悲剧性。

沙汀（1904—）的处女作是1931年4月发表的《俄国煤油》。其后出版的有《法律外的航线》（1932）和《土饼》（1936）、《苦难》（1937）等三部短篇小说集。作家最初的创作意图是“企图反映当时的伟大土地革命运动，以及中国整个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①，《老人》、《战后》都是这方面的尝试。但是，由于缺乏直接感知的生活素养，单凭革命意念写作，便显得力不从心，造成“印象式”的痕迹。对此，鲁迅与茅盾都曾给予恳切的帮助。鲁迅指出：不必趋时，“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②沙汀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把笔触转向了他所谙熟的四川农村的社会天地，把艺术丑作为审美重心，于是，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所谓“天府之国”中的土豪劣绅、兵痞流氓、乡保长以及统治者的爪牙——哥老会中的袍哥光棍等丑类。《丁跛公》、《凶手》、《代理县长》、《兽道》、《在祠堂里》，仿佛是一幅幅冷峻的画稿，揭示出这个黑暗王国里的骇人听闻的兽道和罪行。这些作品不失一种质朴的幽默感，却流布着一种封闭、沉闷得近乎凝固的气息。

艾芜（1904—）是沙汀的同乡。他们几乎是同时走上文坛的。为了创作，他们共同向鲁迅请教过。艾芜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他说：“我并没有想要作文学工作者，只想在那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里顽强地生活下去。”他凭着自己的“勇气和傻气”，尝受了“一个劳

1. 《沙汀短篇小说选·后记》。

2.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动者在旧社会所能遭受到的一切苦难”。^①他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颇有自叙传的意味，反映了知识青年“我”浪迹天涯无处栖身的生活。然而，社会这所大学，却使艾芜的创作具有了奇异的色彩。他写边野地方的风情，描绘一些被生活挤出正常轨道的人们，这样，流浪汉、赶马人、滑杆夫、偷马贼，都被写进了他的小说；对一些被扭曲的性格和变态心理的描写，是他独特的感受。艾芜的作品正是通过这个奇异的艺术天地，揭示了这个不公道的世界。《南行记》、《南国之夜》是他这时期的创作结集。如果说，沙汀的创作格调是冷峻的，以逼人的现实主义，揭示了黑暗沉闷的生活的话；那么，艾芜则是炽烈地探求生活。他的艺术天地诚然也是阴暗的，但是，他却以坚毅的力度，看取生活，对那不公正的社会充满了轻蔑的挑战的态度。艾芜的小说，浮载着一种粗犷的浪漫主义气息，在艺术的画面中呈现出内在的生活力量。

在左翼作家群体中，以血泪凝聚的情致表现农民的苦难与觉醒意识的是叶紫（1912—1939）的小说。叶紫的创作表明了深切的生活感知对于艺术定向反射的粘着作用。他说，“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的人，都时刻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了些什么。”^②“要去刻画着这不平的人世，刻画着我家的遍体的创痕！……一直到，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③叶紫的充满了矛盾冲突并掺和着鲜明爱憎的作品一发表，便受到读者的瞩目。鲁迅曾为之结集、作序，并帮助出版。叶紫的作品有短篇小说《丰收》（1935）、《山村的一夜》（1937）和中篇小说《星》（1936）等。

《丰收》和《火》是由三条互相牵动的线索构成的：一是“展开了

① 《艾芜短篇小说集·序》。

② 叶紫：《星的后记》。

③ 叶紫：《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农事全场面”的描写。再现的真切，对于左翼文学新军创作中思想大于艺术的倾向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和补正，因此，赢得许多读者的心。二是在农事的更移中糅合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这里有奇重的地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高利贷以及“打租饭”等等。作品在首尾贯通中着力揭示了迫使农民流离失所、父离子散的根本因由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这就使作品的思想直接切入了社会现实。《火》中的农民在胡里胡涂、忍气吞声中觉悟起来，汇集而成洪流，冲开地主的大门，逮捕了地主、刽子手；待反动武装赶来时，他们已到雪峰山与红军汇合了。这种壮观的画面，更为30年代的文学增添了新的光彩。三是农民自身意识的冲突。两代人之间所形成的代沟，在作品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云甫叔与立秋（《丰收》）对现实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这使作品更具有内在的力量，从而深化了作品的意蕴。《丰收》、《火》以火一般的激情，血与泪的画面，掩过了毛手毛脚之处，显示出“文学是战斗的”特色。^①

东北作家群

这是一批从东北沦陷区流亡到内地的青年作者所形成的创作队伍。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都是中坚。他们的作品，大抵充满了粗犷的气息。这里的土地、人群，人们的生生息息，沦为亡国奴之苦与抗争，造成一幅幅使人震颤、愤懑的画卷。这批青年作家，有的并未加入“左联”，然而，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和左翼文学联结起来，以地方的风物和人际关系的描写寓含着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念和斗争。

^①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在东北作家群中，萧红（1911—1942）是一位才情超拔的女作家。可惜的是，这位颇具潜能的女作家，年仅31岁时便在战乱流离中离开了人世。然而，她的《生死场》、《商市街》、《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等作品却流传下来，并且呈现出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生死场》被鲁迅称为“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①。在为《生死场》写下的序言中，鲁迅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之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②鲁迅具有分寸感的品评，恰当地肯定了萧红作品的艺术价值。

《生死场》所显示的萧红的“小说学”是“越轨”的，作品把小说与散文的构架契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作品中出现的老王婆、赵三、金枝和二里半，似乎都是主角，又都似乎不是。可以说，它的艺术主体或主角就是它所构建的中国北方的整体艺术世界。这里有着北国的土地和牲灵，有着在生与死的生命线中挣扎着的人群。作者并不美化它们，甚至在沉滞、愚妄中，显示出他们所承受的“报应”和“惩罚”。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是悲悯自己的人物的，也在情境中宣示了历史的文化积淀所酿成的病态和陈风陋习。然而，就是这些自然的奴隶与主子的奴隶，当他们带着历史的风尘，走向斗争时，在这些“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中同样显示出从坚韧、挣扎中所造成的民族抗争的力度。于是，作者的视野、人物的境界都升迁扩大起来，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气息。尽管人们对《生死场》的抗日题旨究竟占多大的比重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说，《生死场》中的农民们，从生生息息、浑然沉滞的氛围中走向民族的抗争，乃是一种发现和别开生面的创造，

^① 转引自葛浩文：《萧红评传》。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而这对于30年代(或者更古久)北方的农民说来，是更为本色，更具特征的。

《生死场》的写作不是一次完成的。1934年，作者逃离东北之前，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上，作品便以《麦场》之一、之二的题目出现了。这时，作品中北方农民的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基调，便确定下来；愈到后来则愈加细致地点化出北方农民的气质和心态。在文体上，萧红不乏更新拓展之处，她把叙事与抒情弥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文体。就叙事来说，或许近于疏漫，但却增添了诗的韵味；情节有些淡化，章节段落，时有跳脱之感，然而土地的气息，农民的心态却在她的努力捕捉之中。辗转的生与死的画面，细腻的人物声情的状写，给予她的小说以散文美的情趣。农民、土地、牲畜在她的笔下仿佛都是有性灵的伙伴，构成生动的“生态”关系。老王婆为了抵债把老马送往屠宰场的情节，是颇为引人的。有些场面，可以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小说《苦恼》中的情境。作家写马、写羊、写牲灵，也是写人，是人的心态的外化。二里半要离开家园抗日去了，那只老羊走过来，在他的腿间搔痒，他对羊说话，在羊棚喃喃了一阵；可是走出来时，老羊却居然跟在身后。二里半把老羊托付给赵三代养，流着泪，摸着羊毛快步走了，“身后老羊不住哀叫，羊的胡子慢慢在摆动”。一切都在民族存亡中打破了旧的秩序，形成新的生与死的抗争。

比之于其他一些作品，萧红的《生死场》所表现的内容也许并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却在抒情的场景中闪现出强劲的民族魂魄。在文体上，她的疏漫也是有分寸的。有些地方疏星点点，或者把“重头戏”放在幕后处理；但是，在人物的心态描写中却掺和着深挚的诗情，这也许正是女性的特有情致，正是如此，也就越是体现了萧红的自我品格。

萧军(1907—1988)的《八月的乡村》，可以说是《生死场》的姐

妹篇。它们是互补的，却又呈现出各自的风采。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说：

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也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与活路。

的确如此，萧军的长篇是以烽火硝烟的壮伟描写，显示着东北人民寻求民族生机的。作品在艺术上也许不能与《毁灭》相媲美，却蕴含着真切的历史感，充满了民族抗敌的豪情和英雄主义精神。鲁迅在为作品作序时，曾提及当时有人向日寇献策：“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八月的乡村》自然并非驳论，然而却以艺术的律动宣示出中国的民魂是不能征服的。这部作品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鲜明的比照：“一方面 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①

民族的抗争过程，是民众觉悟的动态发展过程，《八月的乡村》以相当的深度揭示了它的内蕴。作品以艺术的观照，使人感受到每一个走向斗争行列的人，都在不断地超越自我、摆脱困惑的过程。这里“有的是从农民里来的；有的是从军队里来的；更有的是从‘绺子’上来的”，作家是在复杂的情境中展现这支队伍的。他们不仅肩负着艰苦斗争的重托，也还要割断自我情感的纠葛。知识分子出身的萧明与安娜的爱情线索，在这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在敌人的凌辱中站起来的李七嫂和唐老疙瘩的牺牲，也表现了农民觉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醒的印迹；就是铁鹰队长也需要克制并非“长胜将军”的懊恼。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在生活中的位置不同；但是，冲破旧的意识，冲破旧我，冲破旧的生活模式，这是“民魂”的大冶炼，也是《八月的乡村》更为深刻的意蕴。

比之于圆熟之作，《八月的乡村》可以称为粗犷的素描。作品少修饰，非工笔，但是和生活、时代贴得很紧，在浓郁的北国风情中，流布着雄浑之气。作者自己说，这“是一枚还嫌太楞的青杏”^①，但这带有“野味和生味”的作品，正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当《羊》（1935）、《江上》（1936）以及《过去的年代》问世时，作者的风格已经斐然有成。

在东北作家群中，端木蕻良（1912—）也是30年代出现于文坛的。他的《雪夜》、《鹭鸶湖的忧郁》和略晚发表的《浑河的急流》，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短篇。端木蕻良的创作，既有北方的粗犷浑厚气息，又着力于细致的雕刻，因此使人感到“更有分量，更有虎虎迫人的立体感”^②。在端木蕻良的小说中，风土、人情、性格、氛围是融贯在一起的。如果说，风土体现着地方风习、历史特征的话，人情则构成社会关系的总表征。性格，被作家视为“意识和潜意识的河流”；氛围是“一件事物的磁场”。^③诸般因素，都成为他建构艺术的主宰。因此，不论他侧重于民族抗争的情境（《浑河的急流》），还是把民族的苦难隐在生活场景的背后，整个的艺术世界始终都是充塞着忧郁的时代气息的。胡风说，《鹭鸶湖的忧郁》，虽然写的是平凡的事件，但是由于把“真实，苦难，‘罪恶’和受难者对受难者的爱等等的糅合，创造出了一幅凄美动人的图

① 萧军：《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③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月刊1944年4卷5期。